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1.06.026

论辛亥革命与湖北教育革新^{*}

刘 军

(孝感学院 政治与法律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摘要:发端于清末的湖北近代教育,在辛亥革命之后,得到全面刷新。旧的封建教育制度被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的教育宗旨得到贯彻,新的学制开始推行,省县两级教育行政体系逐步健全。尽管受政局影响一度出现反复,且自身体制远未完善,但这种根本性的教育变革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为民国时期湖北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根基。

关键词:辛亥革命;教育;湖北;清末;“新政”;教育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G527.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1)06-0146-05

一、清末湖北的教育改革及局限

20世纪初年,伴随着封建社会危机的全面加深,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逐渐得到广泛传播,革命风潮也随之涌动。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之下,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中国出现了筹办新式学堂的高潮。在这一全国性的教育近代化进程中,湖北的教育事业一度处于前驱地位。

湖北近代教育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同主政湖北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密不可分。张之洞主政湖北期间,大力对湖北的教育事业进行兴革:通过多渠道筹措经费,大力开设新式学堂;实行旧式书院的改章,培养学以致用新式人才;积极选派出国留学。1902年7月,清廷公布《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而此时的湖北,已经初步形成各级各类学堂均备的新式教育体系:除改两湖书院为文高等学堂,改武备学堂、将弁学堂为武高等学堂,改自强学堂为方言学堂外,另设有湖北师范

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商务学堂、文普通中学堂、武普通中学堂、勤成学堂各1所,以及高等小学堂7所,省城之外各府州县筹款举办的中小学堂亦有10余所。1902年以后,湖北的社会教育、幼儿教育、女子教育也得到了重视和发展,其中1903年秋在武昌设立了近代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幼教机构——湖北省立幼稚园。1904年1月,清廷颁布由张之洞重新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正式法令形式公布并在全国实际推行的学校教育系统,也是张之洞在湖北教育实践的总结和提炼。

清末的最后十年,是湖北近代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的时期,这一时期湖北的教育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省县两级教育行政机构。为了适应办理新学的需要,1902年4月,湖北在全国率先成立“湖北全省学务处”,成为全省学务和教育行政中

* [收稿日期]2011-07-09

[作者简介]刘军(1971—),男,湖北大悟人;孝感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

枢,1906年改称“学务公所”。同年,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要求建立起与新学相适应的州县基层教育行政机关——劝学所,1907年,湖北全省各厅州县劝学所职员计有221人。1909年,湖北各地劝学所达到68个,设有总董69人,劝学员440人。^[1]其时“湖楚教育之盛,甲于全国”,大得地方教育行政的推进之力。

形成了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三驾齐驱、上下衔接的近代教育模式。作为洋务后期重镇,湖北将兴办实业教育提到了战略的高度,当时全国唯有湖北一省全面设立了实业学堂。师范教育也被置于优先的地位,师范学堂、师范传习所数目直线上升,还设有专门的女子师范学堂。小学是湖北各州县兴学的重点,1903年至1910年,全省几乎每一府州县都办起了一至数所高等小学堂和两等小学堂,其中包括一些专门的女子小学堂。此外,湖北省各州县还办起了数量繁多的官立、公立初等小学堂。

按照新学制,各府将所属的书院改设为中学堂,各县级书院则普遍改为高等小学堂。最终,书院这一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此外,湖北的留学生数量也大为增加,如最高峰的1906年,湖北留日学生在全国留日学生总数中“占四分之一”,居全国各省之冠^[2]。

但是,清末的教育改革,包括废科举、兴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措施,表面看是对传统的封建教育做了一些变革,实质上仍受封建思想支配,其指导思想正是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强调封建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教育宗旨,将儒家经典列入学校的必修科目,突出忠君和尊孔的教学内容,虽然也开设一些“西学”课程,但数量有限且不符合中国实际,带有一定的买办性。因此,清末的教育制度仍然是封建主义的教育。

二、辛亥期间湖北革命党人的教育活动

清末推行的“新政”并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政权。但是,相当一部分在新学堂中培养的青年学生和国外深造的留学生接触了西

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感受着民族危难的刺激和群众斗争的影响,思想逐渐转向革命。为了使当时的知识界和教育界从孔孟之道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推动民主革命向前发展,在思想、教育领域里,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清政府推行的忠君、尊孔、读经的封建主义专制教育进行了斗争。各地的革命党人积极开展各种教育活动,一方面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消除封建主义和奴化教育的思想毒素,教育人们奋起革命;另一方面创办革命学校,培养革命的骨干和人才。

武昌起义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主要以创办学校或举办学术团体为掩护和基地,借清末兴学育才之风,以办教育为名从事反清革命的宣传教育,培养革命人才和进行组织发动工作。这些学校或学术团体的创建,直接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不仅是对封建教育的否定,在内容与形式上更具有资产阶级近代化教育的特色,而且为资产阶级革命培养了人才,训练了干部,成为资产阶级宣传革命和发动革命的基地,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为辛亥革命后新的资产阶级教育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湖北逐渐成为革命的中心地区,武汉向称“九省通衢”,革命党人的教育活动也很活跃。1904年,湖北的革命党人成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名为研究学术,实则预谋革命。1906年,革命党人又成立日知会,日知会本来是公开的群众阅报机关,以刘静庵为首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利用这个机关宣传革命思想。由于革命党人工作的努力和深入,湖北的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在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发展形势的鼓舞下,很快爆发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三、湖北军政府时期的社会教育改革尝试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这既是“中华民国”第一个省级军政府,同时又代行中央军政府的职责,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的两个多月中实际上扮演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的角色。这一时期,湖北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承担着除旧布新的重任,因此,加大了社会教育改革的力度。1911年10月19日,湖北军

政府创办的《中华民国公报》发出了《内务部关于放足的告示》，指出：“缠足恶习，有碍女界卫生。躯体受损犹小，关系种族匪轻。现值民国成立，理宜百度维新”。其后不久，军政府内务部发出《关于一律剪发暂不易服的告示》，指出“发辫长垂，原为满清旧俗，既于卫生有碍，又于国体攸关，种种弊害，尽人皆知”，要求“凡我国民，理应亟行剪发，免遗豚尾之差”，并规定“各属军民人等，限文到十日，一律剪尽，以除虜习”。1912年初，湖北都督黎元洪发出《关于民国同胞一律剪辫的告示》，强调“我汉同胞，服制自应一律。既已立成义师，发辫速宜剪剃。”^[3]对于流毒全国贻害经年的鸦片，湖北军政府更是明令严厉禁止。1912年1月20日，湖北军政府颁布《关于严禁洋烟的告示》，指出“洋烟一项，流毒中华，害我同胞，历有年矣，若不一律禁种，则种何以强，国何以富？”，严令“通飭各府、州、县从严查禁，种者按亩重罚，贩则全数焚毁。”^[4]这些放足、剪发、禁烟的举措，在湖北移风易俗，促进社会教育近代化方面起到了良好作用，也为全国做出了表率。

四、民初湖北教育事业的刷新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为了彻底变革封建教育，使教育能够适应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发展需要，“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针对清末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学制、课程等进行了重要的改革。1912年9月2日，新的教育方针正式公布：“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明令取消清政府规定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同时废除1904年推行的癸卯学制，并公布了新的学校系统，即《壬子学制》。至1913年8月，教育部又陆续颁布各种学校规程，对新学制有所补充和修改，从而总合成一个较完整的学校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主要规定有：将学堂改称学校，学校负责人由监督改称校长。初等小学为义务教育，可男女同校；中学为普通教育，废止文实分科，改为四年毕业。整个学校系统为18年，初等教育7年，中等教育4年，大学（含专门学校）教育连预科6至7年。儿童由7岁入学到24岁大学毕业，共分为三段七级。此外还有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两个系统。随后还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校令，对学校

的目的任务、课程设置、学校设备、入学条件、教职员任用、经费及领导管理等都作了详细规定。以上这些均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教育要求，并以法令的形式巩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教育成果。

湖北作为辛亥革命的风暴之眼，《壬子—癸丑学制》很快得到了实施。民国初年，湖北的各项教育事业相比前清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

省县两级教育行政方面，一度摇摆不定。1912年1月，湖北废除提学使司及学务公所，在鄂军都督府下设教育部，不久改称教育司，并于当年3月2日聘请罗田姚彦长担任湖北教育司正长。1914年，撤销教育司，改在省行政公署政务厅下设教育科。1917年9月6日，代总统冯国璋颁布《教育厅暂行条例》，规定各省设教育厅，直接隶属中央教育部，负责全省教育行政管理事宜，各省教育厅长由大总统简任，熊崇熙被任命为湖北省首任教育厅长。1917年11月18日，教育部核准《教育厅署组织大纲》，规定各省教育厅署内设3科。湖北省教育厅按照中央规定设厅长一人，秉承省长之令职掌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监督所属职员暨办理地方教育的各县知事。厅长下设3科，第一科掌管印信、收发文件、办理机要文牍、整理案卷、综核会计庶务、编制统计报告及不属于其他各科应管之事项；第二科主管普通教育及社会教育；第三科主管专门教育及外国留学事项。各科科长秉承厅长之命分别主管各科事务。县级教育行政机关最初则是五花八门，各县不同。1912年2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公布“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规定在县行政公署内设教育科。1915年12月15日，教育部公布《劝学所规程》，规定“劝学所辅助县知事，并综核各自治区教育事务”，再次以清末劝学所定名县级教育行政机关。1923年4月29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令公布《县教育局规程》15条，此后，县教育局逐步取代劝学所正式成为县级教育行政机关。在这一变动的过程中，湖北各县改革的步伐不尽一致。以宜昌县为例，民初仍沿清制，保留劝学所，1916年改设教育公所，并将劝学员改称学董，1919年又恢复劝学所，设所长1人，劝学员2—4人，书记1—3人，直到1925年，才奉命将劝学所

改为教育局。^[5]蕲春县则从1912年至1923年一直称劝学所,并未更改名称。省教育厅和县教育局的设立,使得湖北的教育行政机关趋向稳定。

高等教育方面,清末的高等学堂改为专门学校,据此,官立法政学堂改为湖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农业学堂改为湖北高等农林学堂。此外,民初申请创办的高等学校还有江汉大学、法政大学、铁路建筑专科学校、铁路管理专科学校等。1912年,湖北省管专门学校有6所,学生2068人。^[6]1912年初,鉴于发展教育急需师范人才,民国教育部决定在全国六个学区各设立一所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师即是其一。1913年7月,武昌高师正式筹备,首批招生124人,并于当年11月2日正式上课。湖北跻身为全国6大师范学区之一。此前不久,湖北第一所,也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华大学于1912年5月13日在武昌正式创建。湖北现代意义的大学,即从民初开始起步。

为了贯彻《壬子—癸丑学制》,1912年起,湖北将各类中小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废止读经课,并实行1学年3学期制,即8月至12月、翌年1月至3月、4月至7月各为一学期,1916年后改为一年2学期制。小学教育方面,改初等教育为七年制,即初小4年,高小3年,并在省城复办省立模范两等小学校及附设蒙养院、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属两等小学、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13年8月,湖北省教育司通令实行“强迫(义务)教育计划”。通令规定:儿童凡年满7岁一律入学,违者罚其父兄,经费由各地民众负担;为了解决学龄女子入学问题,令各县暂设女子学校一、二所,待一学期后再行扩充。这一年湖北的初等小学达到9339所,在校学生达23.5万人,比1912年分别增长33.5%和32.4%;高小达到218所,在校学生1.5万人,略高于1912年。^[7]中等教育方面,湖北遵照新学制,改中学五年制为四年制,不再实行文、实分科。按照教育部颁布的《中学校令》:“中学校定为省立、县立、私立三种”。1912年,湖北省教育司在清末第二文普通中学堂旧址开办省立第一中学,次年又开办省立第二、第三中学。因民初废除府的建制,湖北将原有府州划为11个学区,将

原府州所设中学堂改为以原书院命名的中学,并冠以省立之名。县立中学有天门、沔阳、大冶、蒲圻、兴国、云梦、广济、蕲水、黄梅等县立中学及汉口中学。私立中学有中华大学附中、荆南中学、旅鄂湖南学校、应城卓立中学,以及文华、益智、文学、博文、博学、圣约翰、圣约瑟、圣希理达、训女、圣罗以等教会中学。1912年湖北全省有各类中学32所,在校学生2864人。^[8]

民初新学制中,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被单独列为两个系统。民国初年,湖北的中等师范教育有了一定发展。1912年首先在武昌复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1月又在两湖师范学堂旧址开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移至第一文普通中学堂旧址)。1914年,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和第三师范学校分别增设于襄阳和宜昌。此外,武昌还开设了实业教员养成所,大冶、蒲圻等地办有简易师范科(班)。当年,全省有中等师范学校7所,学生458人。此后,1917年襄阳道开办了道立女子师范讲习所,1919年天门县开办了师范传习所,宜昌女子高小开办了附设师范班。^[9]民初的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其中乙种实业学校施以简易实业教育,程度与高小相同,招收初等小学毕业生,学制三年;甲种实业学校,施以完全的实业教育,程度与中学相同,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预科一年,本科三年。1913年后,湖北恢复了工业中学,将其改名为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重建或新建了甲种商业学校、湖北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湖北省第二农林学校、湖北省第二商业学校、湖北省女子职业学校等。其他私立的甲种实业学校有:私立甲种农商学校、商船学校(由李四光等人筹办)、中华银行学校、新民实业学校、实业补习学校、第八学区(郧阳)农林中学校、沙市职业学校、博物实习学校、体育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办的竞存女子职业学校等。根据民初教育部《实业教育规程》,乙种事业学校由各县经办。民初开办乙种农业学校的有襄阳、均县、光化、荆门、蕲春、孝感、汉川、兴国等县,开办乙种蚕桑学校的有南漳、通山、蕲水等县,开办乙种工业学校的有大冶、孝感等县,开办乙种商业学校的有宜昌、嘉鱼、南漳等县。1912年,全省有省立甲种实业学校6所,学生620人,县办乙种实业学校共有37所,学生1984人。^[10]

五、民初反对封建复古逆流的斗争

辛亥革命在冲击封建君主制度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思想。但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体系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社会中的影响根深蒂固。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尊孔复古逆流滚滚而来。民国初年,封建专制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教育方面,复古逆流的中心内容是尊孔读经,推翻民国元年确定的进步教育宗旨。湖北的封建顽固势力趁机大开历史倒车。1913年3月,湖北商民裘平治呈请袁世凯改行帝制。当年9月,黎元洪在武昌举行祭孔大典,要求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一律至孔庙行礼。1914年5月,曾担任湖北民政厅长的汤化龙提出以“孔教”为国教,中小学校恢复读经,他还主张禁止设立女子政法学校,提倡“贤妻良母”教育,要求女子回归家庭。同年,湖北当局秉承北京政府旨意,取消原国民党人创办的江汉法政大学,1915年又将初等学校分为国民学校和预备学校,中学重新实行文实分科,同时进一步拟定整理学务办法,贯彻袁世凯颁行的复古倒退的《特定教育纲要》。对于封建复古教育,湖北的进步人士从一开始就进行抨击和抵制。1912年3月,湖北女子教育总会在全国率先成立,以“扩张女学,补助共和”为目的。随后,湖北省教育总会、法政学会、美术学会、科学研究会相继成立,以开展学术研究,促进民主共和为办会宗旨。1915年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封建复古逆流遭到迎头痛击。1916年9月,北京政府宣布废止读经,基

本恢复了1912年制定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

辛亥革命是对中国教育近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它切断了儒学与国民教育、国民信仰的直接联系,使一切依附于旧的封建政体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失去了主体,从根本上确立了近代教育的路向,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改革和近代化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尽管民初政局动荡,新式教育一度出现反复,且自身体制远未完善,但政治变革的成功极大促进了教育改革的步伐,新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出现,中国的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辛亥革命前后湖北教育事业的革新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生动体现。

[参考文献]

- [1] 清学部总务司. 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Z].
- [2] 学部官报[N]. 1906(8).
- [3] 黎都督关于民国同胞一律剪辫的告示[A]. 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C].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721-722.
- [4] 内务部关于严禁洋烟的告示[A]. 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C].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723.
- [5] 宜昌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宜昌市教育志[M]. 1989:14.
- [6][7][8][9][10]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北省志·教育[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01, 100, 101, 106-107, 102.

(责任编辑:杨睿)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Education Innovation in Hubei

LIU Ju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Xiaogan University, Hubei Xiaogan 432000, China)

Abstract: Modern education originated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in Hubei province was fully refreshed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old feudal education system was completely denied, capitalist education purpose was carried through, the new school system began to be performed, and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at province and county level was gradually perfected. Although feudal educational system was once restored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the capitalism education system was far from perfection, this kind of fundamental education reform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direction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cause of Hubei province.

Key words: the Revolution of 1911; education; Hubei province; Late Qing Dynasty; new politic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